

三國志選注

繆鉞主編

中華文史哲名著選讀



中華文史哲名著選讀

三國志選注

(上)

繆鉞主編

中華書局

三國志選注

(全三冊)

鄒 鉞 主 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橋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33¹/₄印張·583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40301—42800 冊 定價：46.00 元

ISBN 7-101-01552-2/K·679

中華文史哲名著選讀出版說明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具有近四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創造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毛澤東同志四十年前就向我們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條件（新民主主義論）。今天，我們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國各族人民正在黨的十二大路線指引下，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奮鬥。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偉大事業中，多懂得一些祖國文化遺產方面的知識，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進而激發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是十分必要的。這不但是廣大青年和中年幹部羣衆的需要，就是許多退居二線和離休的老幹部，也需要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以充實和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再作貢獻。

爲了適應這種需要，我們特爲編輯出版這套中華文史哲名著選讀叢書。中華文史哲名著選讀擬向讀者介紹我國古代文學、歷史、哲學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以求比較

集中地反映我國古代文明的精華和我們偉大民族的優良傳統。這套叢書除少數幾種採用綜合介紹的方式外，一般都選錄古籍原文，加以簡明的注釋，或附以現代漢語的譯文，以便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爲了便於老年同志閱讀，正文一律用小四號字排印。我局已出版的圖書，凡符合這套叢書要求的，將適當利用，或略作修訂，列入其中。

對於編輯出版這樣的讀物，我們還缺乏經驗，現在出版或即將出版的幾種，都還是試行本。懇切希望廣大讀者，特別是閱讀這套叢書的老幹部同志們，隨時提出意見，以便逐步改進。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七日

前言

一

在吾國二十餘部紀傳體史書中，論者均推前四史爲冠冕。在前四史中，史記、漢書之後，卽是西晉陳壽所撰的三國志，而范曄後漢書作於南朝劉宋時，尚在三國志後一百餘年，所以三國志可以說是緊承史記、漢書之後的一部史學名著。晉書陳壽傳論謂：「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聘直辭於東觀。自斯以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四川南充市）人。生於蜀漢建興十一年癸丑（公元二
三三年），卒於晉惠帝元康七年丁巳（公元二九七年），年六十五歲。

陳壽少時受學於同郡史學家譙周，「聰慧敏識，屬文富豔。」（華陽國志卷十一陳壽傳）在蜀漢時，陳壽出任爲東觀祕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當時宦者黃皓專權，許多朝臣都諂附他，陳壽獨不然，所以屢被譴黜。」

公元二六三年，蜀漢爲曹魏所滅，這時陳壽三十一歲。兩年之後，司馬炎奪取曹魏政權，建立晉朝，是爲晉武帝。先是陳壽居父喪時，有病，使侍婢調治藥丸，當時人認爲此事觸犯封建禮教，加以貶責，因此，蜀漢滅亡之後，陳壽沈廢累年。後來司空張華欣賞陳壽的才華，替他辯護，於是陳壽被舉爲

孝廉，作佐著作郎，又遷著作郎，出補平陽侯相。〔三〕陳壽爲著作郎時，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陳壽定蜀丞相諸葛亮故事。陳壽將諸葛亮的著作「刪除複重，隨類相從」，於晉武帝泰始十年（公元二七四年）在平陽侯相任上時，編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於朝廷，並作了一篇表。表中對諸葛亮做了公允的評價，既稱贊其「逸羣之才，英霸之器」，同時也指出，他「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表中又說，諸葛亮的「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不久，他又入爲著作郎。陳壽爲佐著作郎及著作郎時，都兼本郡中正。〔三〕

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晉滅吳。自漢末以來，分崩離析者前後約九十年，至此復歸統一。這時陳壽四十八歲，他開始整理三國史事，著魏、蜀、吳書共六十五篇，稱爲三國志。張華看到這部書，很欣賞，將薦舉陳壽爲中書郎。權臣荀勗嫉妬張華，因此也不喜歡陳壽，授意吏部遷陳壽爲長廣太守。陳壽以母老爲藉口，辭官不就。鎮南大將軍杜預表薦陳壽爲散騎侍郎，朝廷任命他爲治書侍御史。他奏上官司論七篇，依據典故，議所因革。後來因母死丁憂去職。他母親臨死時，遺言葬於洛陽，陳壽遵照辦理。當時清議認爲陳壽不以母喪歸葬於蜀中故鄉是不對的，於是又遭到貶議。數年之後，起爲太子中庶子，還未就職，就病死了。西晉時，朝政腐敗，權貴恣肆，陳壽才學出衆，以蜀中文士，出仕中朝，其受到排擠是很自然的；而蜀中文士與陳壽同時人洛者，不乏才俊，如壽良、李驥等，又與陳壽情好不終，常相詆議（華陽國志卷十一王化傳、陳壽傳、李宓傳），也增加了陳壽仕途的坎坷。所以陳壽終身仕官不得志。華陽國志陳壽傳說：「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

陳壽之所以能撰寫三國志這樣的不朽名著，並非偶然。他在史學方面早就有深厚的修養。陳壽師事同郡譙周，譙周是一位博學的人，曾著古史考。在譙周的教導之下，陳壽從少時起，就喜歡讀古代歷史名著如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了解撰寫史書的方法、義例、別裁、通識。後來他自己撰寫史書，先從地方史做起。自東漢初以來，蜀郡、鄭伯邑、趙彥信、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等，都是博學洽聞，留心鄉邦人物的，曾作巴蜀耆舊傳。陳壽認為他們的著作還有不足之處，於是除巴、蜀外，又包括漢中，撰益部耆舊傳十篇。^{〔四〕}此外，他又撰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而最精心結撰的則是三國志。益部耆舊傳與古國志都已亡佚了，只有三國志流傳下來。

在陳壽撰著三國志之前，魏、吳兩國都有官修的史書。魏文帝、明帝時，曾命衛覲、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後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資、傅玄等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孫資時，亦曾命韋曜（即韋昭）、周昭、薛瑩、梁廣、華覈等撰述吳書，韋曜獨終其業，定爲五十五卷。魏、魚豢又曾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以上均據史通卷十二正史篇。按盧弼集解引張鴨一說，謂魚豢、魏略所記，訖於陳留王奐時。）這些，都是陳壽所參考依據的資料。當然，除此之外，陳壽還可能多方採訪。至於蜀漢，因爲未置史官，無有撰述，^{〔五〕}所以蜀漢史事，更有賴於陳壽的殷勤搜集。陳壽原是蜀人，對於故國文獻，向來留意，在撰著三國志之前，曾奉命定諸葛亮故事，後來編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所以是具備有利條件的。三國志撰成後，當時見到稿本的人都很讚賞，「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比之於司馬遷、班固，並且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夏侯湛正在撰魏書，

「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陳壽卒後，梁州大中尚書范頽等上表說：「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如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陽令到陳壽家中抄寫這部書，藏於官府。（以上引文均見晉書陳壽傳）

陳壽的三國志，就大體說來，超出於他以前及以後其他諸家關於魏、蜀、吳三國史事的撰著，後人對他評價頗高。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說：「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彧、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問題，引起後人的批評與責難。

第一個是關於陳壽修史態度的問題。晉書陳壽傳在肯定三國志的價值之後，又記載了兩件事，說明陳壽修史態度有時不公平：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見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這兩種受到指責的事是否屬實呢？古代學者中是有人輕信這個說法的。索米一說，周柳、唐劉元濟、劉知幾皆信之。劉知幾甚至於說陳壽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史通曲筆篇）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三國志條，在評價三國志時也說：「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但是更多的學者，則是審情度理，提出異議。早在北魏時期，崔浩即高度評價三國志，而為陳壽辯誣。

魏書卷四十三毛脩之傳

（崔）浩以其（按，指毛脩之）中國舊門，雖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

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駿、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則提出有力的理由爲陳壽辯護。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九陳壽論中說：

「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

朱氏的辨析已甚明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陳壽史皆實錄條中，綜合朱彝尊、杭世駿兩家之說加以申述補充，認爲丁儀、丁廙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立傳？」又謂：「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並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爲嫌。」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二十八跋三國志亦謂：「承祚於蜀，所推重者惟諸葛武侯，……其稱頌蓋不

遺餘力」，與王鳴盛有相同之意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陳壽論諸葛亮條，也舉出許多例證，說明陳壽對諸葛亮推崇備至，所謂因私嫌而於諸葛亮有貶詞者，乃無識之論。綜合以上諸家之所辨析，可見晉陳壽傳所識之兩事都是不足信的，正如王鳴盛所謂「晉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也。〔七〕

其次，後人對三國志責難最多者，是以魏爲正統一事。陳壽修三國志，是以魏爲正統的。書中對於魏國的君主如曹操（曹丕建立魏朝後，追尊曹操爲武皇帝）、曹丕、曹叅等，都列爲武帝、文帝、明帝諸紀，而對於蜀漢與吳的君主如劉備、孫權等，則立爲傳。在魏書中，對於劉備稱帝孫權稱帝之事皆不書，而在蜀書、吳書中，於君主即位，必記明魏之年號，以見正統之在魏。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開始提出異議，主張以蜀漢爲正統。南宋朱熹以後，都贊同習鑿齒而非難陳壽。關於此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條有一段解釋：

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乎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

這個解釋很明白。所謂「正統」之說，完全是爲封建統治服務的，說明當時政權的合理性，其是非標準，以對當時的封建統治是否有利爲權衡。西晉承魏，北宋承周，建都於中原，所以當時史家皆以魏爲正

統東晉與南宋都是偏安江南，情況與蜀漢相似，所以當時史家又都以蜀漢爲正統。陳壽是西晉朝臣，而西晉政權是繼承曹魏的，所以陳壽修三國志，以魏爲正統，這是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這種是非的爭論，在我們今日看來，是並無多大意義的。

這裏還要補充一點。陳壽在西晉政權下撰三國志，在某些書法上，勢必以魏爲正統，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傾向於蜀漢。朱彝尊曾說，陳壽的書取名爲「三國志」，承認魏、蜀、吳三國並峙這一事實。當曹不受禪時，羣臣頌功德，上符瑞者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所引，而陳壽均不記載；至於蜀漢先主王漢中，在武擔卽帝位，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之文，大書特書，「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之用心苦矣。」（曝書亭集卷五十九陳壽論）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書三國志後，更繼朱氏之說，舉例闡發陳壽尊蜀爲正統之微意。當然，我們今日並不必以此標準來衡量三國志一書的長短得失，不過，通過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古人著書，常有不便明言者，而用巧妙的筆法以寄託其深意微旨。所以我們讀古書時，應當結合作者的身世處境，進而探求其用心，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這還是必要的。

另一種對三國志的批評，是說書中時有曲筆，多所迴護，換句話說，就是替封建統治者（尤其是西晉統治者）隱惡溢美。史通卷七直書篇：「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多迴護條舉出許多例證。譬如齊王芳之被廢，是司馬師的主張，事前太后並不知道，而齊王芳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芳

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高貴鄉公親自率兵討司馬昭，爲司馬昭之黨成濟所殺，乃高貴鄉公紀但書「高貴鄉公卒」，絕不見被殺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欲以庶人禮葬之；敘魏與蜀戰爭，常是諱敗誇勝，劉放、孫資本是奸邪之人，而陳壽作二人合傳，說他們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並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大概因爲孫、劉二人有功於西晉統治者司馬氏，司馬氏感激他們，所以陳壽爲二人作佳傳。由劉知幾、趙翼所舉的例證，可以看出，陳壽爲西晉統治者迴護是明顯的。本來封建史書都不免要爲封建統治服務，陳壽身爲晉臣，撰寫史書，當然不便也不敢揭發批評司馬氏，甚至於要爲他們粉飾；況且陳壽記述魏、晉之際的政事，多是沿用王沈魏書，而王沈是司馬氏之黨，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而陳壽也難以多作改動。不過，陳壽在某些地方，還是有時用微妙曲折之筆法透露一點自己的意見，儘管這些意見往往是不符合司馬氏心意的。〔八〕

以上所舉，是歷來學者對於三國志幾點重要的批評，以及對於這些批評意見的討論。其中索米不遂而不爲丁儀兄弟立傳及因父受刑而貶抑諸葛亮的兩種傳說，都是不可靠的。至於以魏爲正統，乃是西晉時修史者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謂「正統」的是非，我們今日也不必多去理會。惟獨書中時有曲筆，爲西晉統治者隱惡溢美，多所迴護，這不免是三國志的一個缺點。

陳壽修三國志，爲了維護當時統治者司馬氏的利益，作了不少的曲筆，但是對於曹魏與孫吳刑政的苛虐，徭役的繁重，却都是據事直書，並無掩飾。同時，其他許多史事的敘述，也都是「剪裁斟酌處，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書事得實條）。茲以諸葛亮

傳爲例，加以說明。關於諸葛亮的史料，文獻記載與口頭傳說都相當的豐富。陳壽作諸葛亮傳時，在史料的取捨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關於劉備與諸葛亮最初相識的經過，魏略與九州春秋都說是諸葛亮自己去見劉備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注引），陳壽不取此說，而根據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所以記此事時說：「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譬如對於孟獲的七擒七縱，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後來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採錄了這些事）。陳壽一概不取，只說：「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當時又有一種傳說：「諸葛亮於建興五年北伐時屯於陽平，遣大軍東去，司馬懿率二十萬人徑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所出。」諸葛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城門。司馬懿疑有伏兵，引軍北去。西晉人郭沖說諸葛亮五事，此爲其一（見裴注引王隱蜀記）。這個傳說既不合事實，也不近情理。蜀漢後主建興五年即是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二二七年），這時司馬懿爲荊州都督，鎮宛城，並未在關中抗禦諸葛亮，況且司馬懿是對於軍事很有經驗的人，也不至於這樣幼稚可欺（裴松之注已對此已加以辨析）。所以陳壽對此事屏棄不取。諸葛亮後出師表載於吳人張儼默記中，就這篇文中的思想與所敘事實看來，都不像是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張儼擬作或他人擬作而張儼採錄的（清人袁枚、黃以周都曾撰文辨析）。陳壽撰諸葛亮傳不錄此篇，是有道理的。從以上所舉諸事例，都足以看出，陳壽對於史料的取捨選擇，謹嚴矜慎。他雖然崇拜諸葛亮，但是對於有些傳說將諸葛亮誇飾得過於神奇者，他都不採用。

陳壽所作諸傳，照顧的方面很廣。凡是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係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者，都根據具體情況，或立專傳，或用附見。不過，也不免偶有遺漏。譬如張仲景與華佗同時，都是傑出的名醫，陳壽爲華佗立傳而忽略了張仲景，史通人物篇已指出這一點，認爲是「網漏吞舟」。又如馬鈞是當時「天下之名巧」，陳壽也沒有給他立傳。至於桓範、何晏都是魏、晉間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陳壽也未曾爲之立傳，大概因爲桓、何二人是司馬氏的敵黨，有所顧忌，故而略之。還有，對於少數民族，陳壽只撰寫了烏丸、鮮卑、東夷傳，記錄了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對於西方的氐、羌諸族以及西域諸國，均未立專篇。至於孫吳境內的山越，蜀漢境內的南中少數族，都甚爲活躍，事迹頗多，陳壽也未立專傳。這也是三國志的不足之處。劉知幾又指出有的「才非拔萃，行不逸羣」，不當立傳者，如「蜀志之有許慈」。（史通人物篇）

三國志只有紀、傳而沒有志，似乎也是一個缺陷。志是比較難作的，江淹認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史通正史篇）陳壽大概是因爲資料搜集的不够，所以沒有作志。

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之弊，各傳中所選錄的文章，也都能擇取最重要者，大都有歷史意義，或兼有文學價值，不像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選錄文章過多，有「穢累」之弊（史通載文篇）。至於陳壽的文章，亦以簡練見長，而對於歷史人物的描寫，在生動傳神方面，則不如司馬遷的史記，亦不如班固的漢書。葉適說：「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文獻通考卷一九一經籍考三國志條引）未免稱讚過高。劉熙載謂，陳壽三國志「練覈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

〔藝概卷一〕李慈銘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闕然無華，范蔚宗後漢書較爲勝矣。」（越縕堂日記）咸豐己未二月初三日。這個衡量是分寸恰當的。

陳壽三國志自從撰成之後，迄今千餘年中，讀者評論，雖然意見也頗有分歧，然大體上都是肯定的，認爲是一部「良史」。但是也有個別的人，對三國志做了全面的否定。全唐文卷六九五劉肅大唐山語後總論：「陳壽意不逮文，容身遠害，既乖直筆，空素舊章。」可見好爲怪論以驚世駭俗者也是自古有之。

在陳壽作三國志後約一百三十餘年，劉宋文帝命裴松之爲三國志作注。

裴松之（公元三七二——四五一年）字世期，河東聞喜（山西聞喜縣）人，他的祖父裴昧已經遷居江南。裴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宋初，官中書侍郎。他奉命作三國志注，即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書成，於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年）奏上。宋文帝很欣賞，說：「此爲不朽矣。」（以上引文均見宋書裴松之傳。）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中說：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序可觀，事多審正。……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

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可見裴注體例，不在於訓詁、名物、制度的解釋（裴注中在這方面亦有相當多的數量），而在於對史事的補闕、備異、懲妄與論辯。雖然後來有些學者認為裴注失於繁蕪，譬如劉知幾說：裴注「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史通補注篇）陳振孫也說：「三國志，本書既率略，而注又繁蕪。」（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三國志條）葉適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所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經籍考三國志條引）但是這些批評並不恰當，尤其葉適的說法更是錯的。裴注所引史料，其中大部分是陳壽同時或以後的人的著作，非陳壽所能見到，怎麼能說是「皆壽書之所棄餘」呢？

裴注搜採廣博，「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九）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幾早已亡佚，賴裴注徵引，尚可見其崖略，並且裴注引書，首尾完具，不加以剪裁割裂，尤便於後人參考。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我們今天讀三國志，必須兼讀裴注，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裴注應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當然，裴注亦偶有遺漏之處，趙翼陔餘叢考卷六三三國志條已指出這一點。

如果進而觀之，裴注之價值，不僅在於廣收博采為三國志拾遺、補闕而已，尚有可稱述者三端：一、為注解古書開創新體例。在裴松之以前，注解古書者，大概都是訓釋文辭音義、名物制度，至於博采羣